

学林

◀ (上接 7 版)

方的文化中心。桂林铁路运输便利,印刷条件也较好。1939年,章锡珊到桂林后,组织编委会,恢复出版开明的招牌刊物《中学生》。此后,开明上海总店还将一批长销书的纸型运往桂林,在后方用土纸重印。1941年5月,开明的协理范洗人带领部分员工到桂林设立“驻外总办事处”,重组董事会,由范洗人出任总经理,并将各地办事处改称分店。1944年6月长沙沦陷,日军旋即进攻衡阳,逼近广西。桂林疏散后,开明总办事处迁往重庆。《信》在后方发行的多种版本,也记录着开明在抗战期间的颠沛流离。

1941年8月,章雪舟主持的成都分店用1938年重排纸型印出了《信》的“成都第一版”,封面主色改为红色。9月,陆联棠任经理的桂林分店推出《信》“桂一版”,封面仍用黄色,书名改用宋体字。1941年3月,重庆政府公布《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组织通则》,要求各省市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,受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指挥监督。6月,原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正式改组为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。《信》“桂一版”的封底即印有“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字第〇〇四号”的标记。这一版本1942年10月又重印为“桂二版”。战前成立的开明长沙分店在1938年11月的“文夕大火”中毁灭,次年迁到衡阳重建,直至湘桂撤退。刘甫琴主管的衡阳分店也重印过一些开明的长销书,《谈美》曾于1942年6月发行“湘一版”,但《信》的湘版尚未发现。

1942年6月,范洗人等人议定成立开明编译所成都办事处,请叶圣陶担任主任,组织出版新书。10月,成都分店重排《信》,由叶圣陶亲自校对(《叶

圣陶集》第20卷,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,80—81页),12月出版。重排本仍称为“成都第一版”,改用传统式标点,订正了此前的误植,封面纯蓝色,仅有叶圣陶的题签。此前内地重印的《信》发行人均写为章锡琛,这一版则以“代负发行责者”章雪舟名义出版。开明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后,还以范洗人名义发行过《信》,如1945年3月的“内六版”,用的仍是1938年上海纸型,未使用成都重排版。

“内×版”与“×一版”的命名似无规律。1941年9月,到江西建立分店的章锡琛长子章士敏在赣县印出了《信》的“内三版”,内文纸型和封面均与“桂一版”相同。1945年,章士敏又在福建崇安建立开明东南办事处。10月,东南办事处以范洗人名义发行《信》的“东一版”,沿用1938年纸型,封面采用新题签,尚不知何人所题。

1946年初,后方的开明书店复员回上海,仍由范洗人任总经理。简陋的土纸本在战后退出市场,新书重用白报纸印刷。《信》回到上海的首个版本于1946年7月发行,除版权页外均与1938年版相同,版次统计为第二十六版。1948年8月,开明从“开明青年丛书”中选出五十种作为第一辑,以盒装形式特价销售(1948年8月18日《申报》广告)。这五十册统一更换为蓝色边框的封面重印,称为“特一版”。朱光潜的三种作品《信》《谈美》《谈文学》也在其中。

抗战期间《信》各版的定价不一,有的未标售价。第二十六版的定价与“内六版”相同,为国币一元一角。内战继起,时局动荡,物价飞涨,商家严重亏损,只得改按标价的若干倍数出售。1947年5月,开明把书价提高到原定价的3000倍,6月即涨到4500倍,10月又定为每月初调价(《叶圣陶集》第21卷,180页、192页、220页)。当时白报纸尚须进口,由政府统一拨



1948年8月,开明从“开明青年丛书”中选出五十种作为第一辑,以盒装形式特价销售。这五十册统一更换为蓝色边框的封面重印,称为“特一版”。朱光潜的三种作品《信》《谈美》《谈文学》也在其中。

给外汇向外商订购后,按定额分配给各家报业书业。配给纸提货时原按订货时的外汇官价结汇,因法币不断贬值而远低于市价。1947年8月,外汇管理办法和进出口贸易办法改订,购纸以市价汇率结汇,使书业成本大大提高,各家被迫压缩用纸。外汇新政无法挽救外储枯竭和法币的崩溃,为应对恶性通胀,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,收兑法币和金銀外汇,冻结物价,规定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一元。1948年11月重印的《信》第三十版定价因此改为“金圆三角三分”。金圆券出台后迅速贬值,11月当局又发布修正办法,取消限价,允许兑换金銀外币。1949年3月,《信》发行卅二版时已不再使用金圆券标价,仅印“一元二角”,无货币单位。这一版重排了纸型,字号小而行距密,正文仅98页,更正了目录的错误。这也是《信》在民国上海留下的最后面貌。

1950年2月,开明书店主动申请公私合营,6月应要求将总管理处迁往北京,1953年与共青团中央主办的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。历经二十余年浮沉的开明书店从此退场,出版过的书籍绝大部分停版,《信》也在其中。

抗战胜利后,国民政府收复台湾。新任台湾公署教育处处长范寿康系范洗人之侄,曾任开明书店董事。开明复员不久,章锡琛离开上海,应范寿康之邀赴台湾,管理教育处新接收的印刷厂。章锡琛在台北新建了开明分店,由章士敏担任经理。后章锡琛与章士敏均返回上海,1948年5月,刘甫琴调往台北分店任经理。1950年12月,开明台北分店改组为“台湾开明书店”。1946年,索非也接受范寿康邀请来台开办书



1958年,台湾开明重版了朱光潜的《文艺心理学》《谈美》《谈文学》和《我与文学及其他》四种曾在开明出版的作品,称为“台一版”,著作者均写作“台湾开明书店”,未出现朱光潜之名。上图为《谈美》台湾开明版封面和版权页。



店,后辞职转入台湾开明。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作者无法通过台湾当局的审查,出版社翻印这类书籍时,通常隐去原作者或改为其他名字。1958年,台湾开明重版了朱光潜的《文艺心理学》《谈美》《谈文学》和《我与文学及其他》四种曾在开明出版的作品,称为“台一版”,著作者均写作“台湾开明书店”,未出现朱光潜之名。《谈美》原由朱自清作序,因朱自清已在1948年去世,其序言和姓名得以保留。《谈文学》中朱光潜的自序和《我与文学及其他》叶圣陶所撰序言均被删除,替换为新的“作者小言”和“小言”,实出自台湾编者之手。编者甚至将《我与文学及其他》部分文章抽去,书名改为《诗论》(朱光潜原著《诗论》在正中书局出版,无开明版)。

《信》却是朱光潜唯一一本曾在台湾禁止发行的书。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《信》在1954年11月由“台湾省保安司令部”查禁,同时还禁有一个书名写为《给青年十二封信》的翻印版。另有一种题为《写给青年们的信》的翻版,从页数来看似为《信》与朱光潜抗战中撰写的另一部谈青年人生问题的《谈修养》合刊,1966年被查禁。此外,台北乐天出版社翻印《信》时,将作者改名朱潜,1973年也被禁售。四种版本遭禁的理由,均是莫须有的“为共宣传”(“台湾省政府”、台北市政府、“台湾警备总司令部”编印《查禁图书目录》,1977年10月,118页、123页)。1987年后,《信》方在台解禁。

《信》从1929年3月结集出版,至1936年7月已发行逾五万册,在开明书店的销量名列前茅,为哲学类之冠(《开明书店开业十周年纪念特刊》,载1936年8月1日《申报》)。1947年底,朱光潜曾谈到《信》:“于今

快到二十年了,这部小册子在我的十部左右的著作中还是销路最好的,总共销数大概已在二十万册以上了。”[《作家及其作品特辑(二)》,载1947年12月25日《大公报》(上海版)]此书异常畅销的一个因素是其篇目被选入多种教材,进一步扩大了知名度,在学生间一代代流传不息。开明1928年起推出的“活叶本文选”便从其中选录多篇,此后夏丏尊、叶圣陶等合编的《开明国文讲义》(1934年)和《国文百八课》(1935—1938年)都选用了《信》的内容。除开明自家外,“商中世大”四大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也均有多种取材于《信》。1929年由中华书局朱文叔编选的《新中华国语与国文》(以“新国民图书社”名义出版)第二、四、六册分别从《信》中选取了三篇文章,成为《信》正式进入国文教科书的开端。朱剑芒编、世界书局1929年初版的《初中国文》第五册,张弓编、大东书局1931年版《初中国文教本》第六册及傅东华编、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《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·国文》第三册也都选有《信》的文章。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推出的《初中国文》(叶楚伦主编,1934年初版)等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亦有采用。

《信》广受欢迎,也带动了一波用书信体对青年做出指导或宣传的潮流,1930年代起陆续出现了一些同类作品,如舒新城《致青年书》(中华书局1931年初版)、夏瑞民《致青年》(文艺书局1931年)、周乐山《给青年的信》(北新书局1933年)、杨默石《给新青年的信》(南星书店1933年)、平心《生活与思想之路》(光明书局1937年)、贝尔《献给年青的一群:给大时代青年的五十五封信》(亚星书店1940年)等。亦有仿照《谈美》专讲一个领域的,如贺玉波《致文



夏瑞民(即顾其城)的《致青年》(左)1936年改名后重新上市,署名改作“朱光潜”,封面设计也与《信》相近(右),故意混淆视听。朱光潜发现后,撰文《朱光潜给朱光潜——为〈给青年的十三封信〉》予以揭露。